

那年到南京,南京的朋友一时兴起,要拉我们去江都吃河豚。说走就走,容不得半点迟疑。为了赶上这席河豚宴,我们过扬州时,在瘦西湖也只是草草地绕了个弯——好像是在应付似的,至今想起,还是觉得挺对不起那二十四桥明月的美景——就这样,我们一口气赶到了江都,当日的江都还是单列的市,现在已是扬州的一个区了。

朋友的河豚宴,席设江都的人民饭店。那是一家非常一般的饭店,名字很一般,店容也很一般,是一副解放初期国营店的老旧面孔。门脸临街,没有任何装饰,倒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与笃定。因为是熟人,我们由主人娴熟地引导走胡同边的后门(好像有点神秘)。过工作间,过厨房,进入楼上的一个单间,一切都是不加修饰的随意和简陋,如同它那叫做人民饭店的名字和它的太不在意外观。我们本来就是为美食而来,是用不到讲排场的。对于这些成了精的“吃货”(用现今流行的称呼)来说,只要食材和烹调到位,再简陋的环境也都不会影响他的食欲和味觉的。主人为这桌宴席倒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养殖的,野生的,清蒸的,红烧的,各个品种,各种做法,上桌时主



江都河豚宴记 谢冕

厨先“试吃”——这是当地吃河豚的规矩,为了减除食客的顾虑——一切都有板有眼的。

河豚宴的主角当然是河豚。在主菜未上桌时,端上了一只热气腾腾的其大无比的砂锅,里面是每只都大如拳头的清炖狮子头。狮子头是淮扬名菜中的翘楚,在中国菜中北方的四喜丸子,潮汕的牛肉丸,各地大大小小的煎的、炸的、红烧的、清煮的类似的菜肴,都没有扬州狮子头的名气大。这砂锅的突袭当然给我们以惊喜。十只大狮子头,汤是清的,不见油星,上面漂着几片豌豆苗,也是清清爽爽的,如同清澈的湖面上,微风吹皱,

小小的波纹上的几叶绿萍。再看那狮子头,恍若长在水中央的大花朵!细细品味那狮子头,六分肥,四分瘦,斩成肉碎,再加上荸荠,也是剁成碎丁的。没有过油,因此底色是白色

的,那瘦肉显出淡淡的红,白里透红的是含苞待放的绣球花!是否揽上了蛋清我不知道,它给人的口感却是准确无误的——糯糯的,软软的,松松的,入口即化却又又是脆脆的,平生没吃过过这美味的狮子头。

江都人民饭店,我记住了这个不起眼的店家,这个有点神秘的从巷子进入后门,再登楼进入“雅间”的人民饭店。那天,我一口气吃了两只大狮子头——边上的朋友见我嘴馋,把应当是她的那一只也让给我了。至于那次豪华的河豚宴是什么滋味,那厨师精心制作的频频上桌的各式各样的河豚各是什么特色,我已浑然不知,我是彻底地被一大砂锅的

绣球花也似的、清清爽爽的狮子头迷住了。

这应了那句成语:喧宾夺主!江都回来,再遇到肉丸子、四喜丸子、鱼丸子、素丸子或者煎的、炸的,炖的、勾欠的、清煮的,无论产自何地、出自哪家著名宾馆的叫做狮子头或不叫狮子头的,我一概认为,天下的狮子头只有这家最地道。我下定决心,我一定要重新回到江都,回到人民饭店,再从那后门进去,上楼,找到那间“雅座”,不吃河豚,只吃狮子头!

我的这篇文字,不应当是江都河豚宴记,更准确地说,应该叫人民饭店狮子头记。



不求甚解 聊以自娱



意在斯

篆刻 陆康

这些年,凤伟新村里的居民总是忽多忽少,全看“崇明要开发了”的嚷嚷沸腾到什么程度。

老杨和她整天满脸微笑的老公老何继续打散工。老何告诉我,他现在干一天的活能挣50元,最近的活计是在玉米地里砍玉米,那是给牛吃的老玉米。我很想问:给牛吃的是玉米粒,还是玉米棒,或者整棵玉米?但我没好意思问出口,怕他觉得城里人太无知。

他们的儿子,带着老婆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去了长兴岛。老杨说,儿子把原来的4吨头的卡车卖了,换了一辆更大的,在长兴岛拉土,不拉土的时候替老乡拉码头上的货。那老乡承包了码头。

老杨说,长兴岛的物价比崇明贵,那里有上海迁过去的造船厂,城里人多,菜市场里的摊位有上百个呐,生意不好做。听口气老杨已经去长兴岛考察过蔬菜买卖了。别看老杨种地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却非常能干,家里事都由她拿主意,而且她比一般女人有开拓精神,带领全家离开安徽老家来崇明岛闯荡,就是证明。她最终不跟儿子去长兴岛,继续留在凤伟新村,一定有她精明的打算。

在文艺评论中,无论是褒奖、说好话,还是批评、说“坏话”,要说到位、说到点子上都不容易。这跟评论者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涉及诸如学养、知识积累、艺术感觉等等。

文艺评论的专业水准、专业眼光首先体现在什么该评,什么不该评。前段时间关于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一事,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话题。我觉得作为新闻事件报道一下无可厚非,但对他们分手原因作涉及个人隐私的种种猜测则有失厚道。甚而有人发文批评张艺谋对分手原因不作回应是“恃宠而骄”就过于言重了。“二张”分手完全是他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凭什么非要张艺谋把分手隐情抖搂给大众媒体?此事跟铁道部的宣传片事件性质完全不同。因此而批评张艺谋“恃宠而骄”缺乏依据。

通常说好话说不到底子上,不会引起被评论者的强烈“反弹”。因为生活中几乎无人不喜欢听好话,只要是好话,听话者一般不会在乎你讲得在行不在行。你表扬过头了,给被评者罩上许多名实不符的光环,没准儿被评者还挺受用。但也有例外,评论家毛时安先生有次参加一位老艺术家的作品讨论会,与会者说了一大堆好话,却让老先生越听越窝火,因为那些评论家评价的都是他若干年前的旧作,对他近期的创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碰上如此较真的艺术家,说好话而不过好,也就在常理之中了。也许,对于这样的老艺术家,你是表扬还是批评并不重要,关键是话语要扎到“穴位”上。

需要更为谨慎对待的是写批评文章,尤其是靶标非常明确的批评文章,一不小心,就会产生误判、误读、伤及无辜的效果。即使你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但文章的说服力无疑就大打折扣,甚至会引来被批评者的强烈反弹。

老杨的女儿最近也从安徽来崇明了,在凤伟新村附近的军用机场招待所找了一份工作,月工资1000元。

楼上305室的住客搬走了。这是个吃劳保的双目失明的中年男人,由母亲照顾。母亲不在,他就经常把家里搞得水漫金山。他喜欢在家里大音量播放音乐,周围邻居叫苦不迭,却不好意思说,对楼阿婆只

我的左邻右舍 ——惬意崇明岛 任雪蕊

好对我私下嘀咕:“这个人闹得狠!”对楼105室的也喜欢大音量,他是卡车司机,我怀疑他耳朵不太灵,只要在家,就音响震天,楼板都会发出颤音。邻居们天天聆听各种各样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和革命歌曲,嗲溜溜的女声用气声唱《红星闪闪亮》,粗辣辣的男声猛吼《茉莉花开放》,而且还是摇滚乐。

也有安静的,楼上的新租户就是,一对小夫妻,从台州来崇明种西瓜。凤伟新村周围有大片西瓜棚,都是台州农民来种的,一般都是在田边搭几个油布棚,一家老小住在里面。

现代作品之先河。

刚推出音乐会时,渴望接受各种艺术新思潮的观众挤满了演奏厅。但结束后各种意见也接踵而至。王甫建很坦然:“演奏这些曲目,作用就是实验、探索,这是一种积累的过程。音乐家通过新创作努力寻找声音的最佳表现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心,王甫建在指挥台上的时间越长,指挥路子也越宽。人们说他的乐器是指挥棒,其实是他的一双有智慧的手。这双手在控制乐队同时,把我们民乐的音乐艺术带到更广阔的世界。

为什么要让古筝演奏员参与研制篪篴?明日揭晓答案。

十日谈

民乐传人情话

最常见的“低级错误”是没弄清文章真实含义,就妄下断语,大加挞伐。以敝人亲历一事为例。某日,我的邮箱收到一篇批评文章,“靶标”是我刊发在《羊城晚报》专栏的一则短文。作者是一位写过不少批评文章的老先生。我在回复中表态,大意是:“此文严重误读、曲解了我的文章原意,并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指责。但我尊重作者说话的权利,作者愿意将此文发往何处请自便。”我那篇小文的大意是说“鲁郭茅,巴老曹”,是带有特殊历史烙印的对现代文学史上几位前辈文学大家的浓缩称谓。这个“浓缩称谓”,带有排座次的意味,明显不公平地忽略了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等同样为现代文学大家的文学成就。仅就这个“浓缩称谓”中六人的前后排序是否合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不必对现代年轻人说不出“鲁郭茅”的含义是指什么而大惊小怪。历史在进步,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应抛弃那些陈见。文尾,我特别强调:“忘记这样一个特殊年代的浓缩‘称谓’,并不是要我们忘记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的文学地位和作品价值,读者和时间自会作出权威鉴别。有的人可以活在文学史上,但却无法活在读者的心中。”我的文章虽短,但已清清楚楚地表明:我的观点,只是针对“鲁郭茅……”这个浓缩称呼而言,并非是要青少年忘记那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而此公的批评文章则指责拙文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简单化、庸俗化、妖魔化”,“怀疑他们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是“极不负责任的荒谬言论”。

老先生虽年事已高,却还能坚持写批评文章,其实是挺可爱的。但总的感觉写批评文章不能一看到文章就“恨恨地磨墨”,“火气太大”,否则容易欠缺客观、理智的判断。

这对小夫妻却花钱租房——我们这里都是一室或一室半,月租80元。也许他们是新婚?两人早出晚归,一人一辆自行车。每天傍晚,两辆自行车会靠在我家门外的走廊里,早上起床开门,它们已经不见了。

他们似乎不爱跟人搭讪。但有好几次,悄没声响地,我们家门口的地上,却被摆上了好几个西瓜,我们都不知道该对谁说谢谢。

每天傍晚,我们都要去附近林子和田边小道走上一个小时。时间通常不到六点,邻居们却早已吃过晚饭,出来乘了一阵风凉了。看到她们摇着蒲扇慢慢踱步,我总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的夏天。

凤伟新村以前是农场的宿舍区,后来工厂关门,农场撤销,知青回城,新村里十室九空,只有夏天的傍晚,才稍稍显得有点热闹。夕阳西下,居民们分聚几处,小板凳,藤躺椅,聊闲天,下象棋……新村东面就是田野,从海上吹来的东风一马平川。

以前,我们带着丑丑一路走,邻居们会因为丑丑的滑稽模样跟我们搭讪两句:“这狗有的吃,胖啖!”现在丑丑走了,对我们也看惯了,她们就只是目送我们走过,偶然飘来一两句:“格两个上海人……”

想想也是,两个外来人,为什么要经常来这一片荒僻冷落的破旧房子里住,而且住就是九年,毫无离开的意思?换了我们,大概也要奇怪的吧。

那还是七八年前,我们刚来不久,有朋友来小区看我们,下了车在路口打听,还没报出门牌号,就有人知道是谁准了:“噢,那两个上海人!”

朋友一见就问:“你们在这里成名人了?!”



几年前,淼镇开了一家玩具店,这是小镇里唯一一家专营玩具的商店,虽然之前小镇上也有卖玩具的地方,但最多是在卖百货的超市里设立一个专柜。

玩具店是戒尘师弟最爱的店铺,每次路过,看到橱窗里摆放的各式各样玩具他便走不动路了。

有次戒嗔和智缘师父以及戒尘一起去山下办事,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玩具店,玩具店的老师林施主和智缘师父比较熟悉,便招呼我们进去坐坐。正好那天不是很忙,再加上智缘师父看着戒尘一脸渴望留恋的样子,便笑着接受了林施主的邀请。戒嗔和智缘师父一起坐在林施主的茶几旁喝茶,而戒尘则老实不客气地跑到柜台里玩玩具。智缘师父一边和林施主聊天,一边盯着挨个乱摸玩具的戒尘,生怕他把玩具弄坏弄乱了。

过了一小会,戒尘也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一个天平,他跑到我们坐的茶几旁边,问林施主,这个也是玩具吗?林施主说,这个不是玩具,是替镇上学校采购的实验用品。

戒尘把天平放在茶几上,然后打开天平附带着一个小盒子,那盒子里放着各种重量的砝码,最重的有五百克,而轻的只有一克重。

戒尘把砝码统统倒在桌子上,然后大小小挨个往天平上放,天平则是在砝码的改变下升降降降,大家都笑着看他。都觉得小孩子的乐趣果然是不同的,如此简单的玩法,戒尘也可以玩得如此尽兴。戒尘又玩了一会,然后拿起了那个只有一克重最小的砝码,将它轮流放在

一克重的砝码

释戒嗔



但王甫建随即被这种极具个性的声音深深吸引:“西洋交响乐是西方音乐艺术的精华,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很难达到其现有的水准。而民族音乐则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经过认真的传承研究和科学的发展,可以创建我们自己的优秀音乐体系”。于是他开始到民乐系课堂旁听,到戏曲学校听各流派唱腔,到乐器厂了解乐器制作过程和发声原理等。带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沉浸在対民族音乐的钻研和迅速熟悉中。

成绩很快就在努力中开始显现,1984年开始,学院青年民族乐团开始发展成具有专业规模的新型民族乐队。但他明白乐团的发展不能仅靠传承,必须通过新的创作和改革不断推进。

为了呈现新声音,就必须要有新作品。王甫建开始逐个鼓动自己当年作曲班的同学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钢、陈怡介入民乐创作。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新一代作曲人才的领军人物。当时王甫建就认为,

寻找最佳声音

沈次农

如果这些人能投身民乐创作,那么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艺术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在他的鼓动下,一批优秀的作品面世。

随着新作品的到来,王甫建却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原来那年代不仅是恢复传统的年代,更是一个创新活跃的年代。

新作品中不仅有传统技法,更有人开始用现代技法写作。对这样的现代作品,乐队不熟悉,指挥当然也不熟悉。而指挥还要承担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必须先于乐队吃透作品技术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要求,并对每一个声部提出自己的要求。王甫建回想当初的困难,感慨颇多:“现代作品节拍复杂,各种调性转换很快,有些还是无调性的,其中还会有大量的复合拍子,这让传统教学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非常不习惯,完全找不到感觉。”王甫建在排练时一段一段地对乐队进行指导,很快让乐团适应他的指挥思想、风格和要求。1985年王甫建指挥学院民族乐团在北京推出民族音乐现代作品音乐会,首开民族乐队演奏

十日谈

民乐传人情话